

# 试论苏州地区庙会文化空间的特征

沈建东

## 一 苏州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庙会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肥沃的太湖流域平原和丘陵地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考古发现了大量石制工具，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稻作文化和渔猎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有发达的稻文化和渔文化，宋时范成大《吴郡志·风俗》所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吴地山川之秀，河湖之美，使吴人尽得山川河湖之利，农业的发达和物产的丰富形成了饮食的多样化，吴人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馈赠和自己改造自然的成果来丰富和美化自己日常的衣食住行，并使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而且苏州自古手工业发达，苏州地区的许多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曾发掘出土了大量经过加工已相当精美的玉器，反映了吴地先人创造性的智慧和特有的审美品位。隋唐以降，北方战乱频繁，大量北人南迁，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魏晋南北朝时，门阀贵族尚文清谈成风，佛道的普遍传播；宋时以宣扬儒学为主的府学和学风比较自由的书院的兴办，使苏州民风变为崇经好文，温文而雅，苏州文盛出状元由此而发。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家家礼乐，户户读书的风气，明范谦有诗云：“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普通的市民阶层也尚读诗书赏字画，民间收藏善本骨董成风，追求高雅精神

享受已成为了社会风尚。乾隆《吴县志》载：“吴人滑稽，谈言微中，善谐之恢，又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奕谱，钻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冰石，装璜卷轴必仿宣和。旁及种菊艺兰，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

由于南宋定都杭州，苏州又成为了朝廷依靠的重要地区，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明清时期是苏州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高峰期，发达的稻作生产，文化上的典雅尚文，风俗上的重节好游、清嘉宜人，工艺艺术的秀丽精致，使四方之士无不为之倾倒。出现了“苏作”、“苏州货”的称呼，甚至民间还有：“破虽破，终归还是苏州货。”的谚语。形成了“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之，俗者，则随之而俗之。”的风尚。有人甚至把这个时代称为“苏州时代”。在苏州几千年的历史积淀里，独具苏州特色的庙会文化也是我们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传承和保护好这些民间信仰特征具有吴文化特色民俗活动的庙会文化，雅俗共赏的审美共识下，形成传承的纽带和延续的理念，让世代吴地民众在喜闻乐见的庙会民俗氛围里，从容品味着自己古老而恒久的文化底蕴和人生期望，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苏州地区的庙会文化具有在一定群体中和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活态存在的特征，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科学价值。虽然吴地自古好神祇，喜淫奢，有识之士多有针砭，明代王稚登写了《吴社编》专记吴地庙会之事，以刺时弊，他曾尖锐地指出：“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鬼神，舍医药而崇巫覡，毁宗庙而建淫祠，黜祖祠二尊野厉……”<sup>1</sup>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他的《苏州史志笔记》里引用了张紫林的《红兰逸乘》“论吴中神祠”二则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苏州三节迎神赛会之所以繁盛，实由于各衙门吏役之假公济私，募缘不足则勒派，成为压榨人民金钱之一种方法。人民误堕术中，又有传统之迷信引诱，故遂甘于输将也。”但要把握苏州地区基层社会的民众到底有着什么

1 [明]杨循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从刊》，广陵书社，2004，第169页。

样的信仰,庙会文化为什么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从分析它的文化特征入手不失为一种探求的方法。

## 二 苏州地区传统庙会文化空间的特征

联合国新通过的《保护公约》中曾这样表述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示、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这一界定涉及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和相关的文化空间。由此可知所谓文化空间就是既有口头传统又有传统的表演艺术,既有民俗活动又有礼仪节庆以及相关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节日娱乐和在时间和空间的立体展示。这种不断的重复展示就是一种传承,并和社区群体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更促进了文化多样性著称的人类的创造力和传承力。苏州传统庙会文化空间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是吴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庙会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关系到宗教信仰、商业、民俗、文艺、娱乐等诸多方面。”<sup>2</sup>它既是民间信仰的延续部分,也是民间节日和民间文化、手工技艺的展示窗口,它还是民间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换的地方。有庙皆有会,是为庙会。在明王稚登《吴社编》中对庙会有生动的描述:“凡神听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

2 段宝林:《庙会的民俗本质》,《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第40页

伶伎乐粉墨绮縞,角觝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霭迤邐,日夕翱翔去来,云屯雾散,此则会之大略也。”<sup>3</sup>据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苏州史志》统计,清初苏州府境内有历代建造的寺庙、道观514座、神祠229座、乡厉坛255座,是全国寺观坛祠最多的州府之一。明洪武《苏州府志》云:“东南寺观之胜莫胜于吴郡,栋宇森严,绘画藻丽,足以壮观城邑。”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逐渐复苏起来,许多的庙宇道观得到了修缮,庙会随着旅游文化的兴盛也在各地此起彼伏,苏州地区的传统庙会由于它悠久的传承和吴文化的特色,也成为苏州旅游文化、地方交流、民间文化娱乐载体而复苏、扩展。纵观古今,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和庙会文化具有传承性、周期性、人文性、群众性、兼容性等特征,现试析如下:

### (一) 苏州庙会文化空间的传承性和周期性特征

庙会民俗,是人类社会各民族普遍传承的重大显形文化事象,它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从古到今,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不间断地延续着、丰富着、发展着,构成了人类在时间和空间活动上一部五彩缤纷的文化史书。庙会文化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周而复始,首先给人以强烈的周期感,传统庙会民俗以其多彩多姿的信仰民俗活动和饮食娱乐的物质外在,给予人们以强烈而真切的心理寄托和生理满足与享受,从而给人们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成长在这个环境的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浸润这一文化习俗,形成传承的纽带和延续的理念,人们可以借重这一庙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周期性展示,和自然进行交流协调,人与人之间进行协调和交流,人们借助于这一传承的方式和手段,从容品味自己古老而恒久的文化底蕴和人生期望,人们膜拜神灵,祈祷幸福生活,祝愿吉祥,往往形成庙会文化的系列化和延续性,人们酬神祭祖、歌舞娱乐、游艺竞技,千百年来周而复始,都具有浓郁的传统庙会文化空间的传承性和周期性特征和色彩,这样年复一年的日积月累形成的社会

3 [明]杨循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广陵书社,2004,第169页。

心理,传统习惯,对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个体形成一种约束力和驱动力。这种约束力和驱动力有意或无意间也会形成传统民俗的传承世袭力量。同时传统庙会文化空间还包容和涵盖多种文化元素和宗教信仰、地方习俗特性,传承和周而复始的特征又使庙会文化像生命繁衍的基因一样延续不断,或隐或显地对现代人的生活也起着不同程度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但这样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在由此及彼的过程中随时间和空间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说传承性和变异性是庙会民俗最突出的特征。如苏州地区有影响的烧新年香和虎丘庙会的传承和变异就是如此。烧新年香在新年正月初一,各家开门爆仗后,第一件事就是烧香供神,过去苏州人这一天要去家族祠堂谒拜祖先。称“求忏”。农村则习惯在此日在灶前插香。城中士女都至城中玄妙观烧香拜神,在此期间,玄妙观内游人争涌,商贩云集,已然庙会,三清殿前、有设画摊殿前的,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观内无市鬻之舍,支布幕为庐,晨集暮散。”有卖糖果小吃,琐碎玩具,针线布头等什物小件的,卖橄榄处更是人头攒动,人们买青橄榄带回家泡元宝茶,以祈新年财源滚滚。各地杂耍艺人各表演的各色杂技,“走索”、“穿跟头”、“吞刀”、“吞剑”最吸引人们的眼球,孩子们则爱看傀儡戏,俗称“木人头戏”,以及西洋镜、隔壁戏、皮影戏,有盲人男女,擎木鱼铜钹,唱前朝故事,谓之说因果,有琵琶弦索檀板合动而歌的滩簧,以及测字、算命……茶坊酒肆和小食店,门市如云,热闹非凡,各种苏式的小吃、糕点琳琅满目。正如清人范来宗《游观》诗云:“仙都玄妙六门中,遐迩争趋老少同。大地广场逾鹤市,诸天法相若龟宫。种桃道士重门杳,买果儿郎百戏空,何是千人齐引领,香舆裙露石榴红。”

除玄妙观外,市民烧香还有城西的戒幢律寺院(又称西园寺)和城北的北寺,人们到西园寺烧新年香,祈佛保佑新的一年平安、发财,此俗流传至今不变。北寺烧新年香到清后期已衰落,今天北寺已成了城内的一个旅游胜处,香客已很少光顾了。苏州旧俗,善男信女新年必烧十庙香而止,回家后须炷香于家堂神前,称回头香。烧新年香今演成抢烧头香的习俗,善男信女吃过年夜饭后,匆忙赶到庙中,以抢烧到头香为新年吉兆。

虎丘庙会由苏州虎丘每年农历二月十二花神灯会和清明山塘看会组成的,农历二月十二百花生日又称花朝节。苏州虎丘一带,自唐宋以来大多以种花艺树为生,“四面青山耕织少,一年衣食在花开”。花神生日,花农具牲献乐,举行谢花神的花神庙会,花农们抬出花神,担灯夜游,击乐歌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丰收,万事如意,称花神灯会。蔡云《吴歙》诗云:“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此诗描绘了苏州花农仲春时节,为百花贺生日的生动情景。

考史籍,为百花祝寿的习俗由来已久。北宋时,花朝会在二月初二。后又定在二月十二日,到明代,祭花神习俗在民间盛行。苏州花神庙在虎丘桐桥边,建于明代洪武年间,除正殿花神像外,还旁列十二花神。虎丘另一座花神庙在虎丘山东。建于清代乾隆四十九年是为了纪念“郡人陈维秀善植花木。得众弁性……花乃大盛”而修建的,庙中有一对联极为工妙,上联是:“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下联:“二十四番风信,吹香七里山塘。”其实,花神崇拜是植物崇拜,也是自然崇拜的一个内容,是万物有灵论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花木之神已被人格化,一花一木皆有一神,到以后有总管百花的花神出现,有所谓的“花神生日”,后又以善种花者为花神,有了行业神的色彩,是将其作用社会化了。如今虎丘年年春天都有花会,百花盛开,人潮如涌,苏州人继承传统,又善于创新,正不断用鲜花美化苏州城市的美丽,同时新的时代又赋予百花全新的蕴意,百花盛开象征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好时代。

旧俗,清明日有城隍出巡视察民情活动,并致郡厉坛,接受各乡土地祭祀,所谓郡厉坛,据清陆肇域、任兆麟编纂《虎阜志》载:“郡厉坛,《姑苏志》:在虎丘山前。附郭三县统祭于此坛。”其形制是:“累石为之,广袤各三丈,高四尺。官主祭,三县官陪祀……”府县官吏皆至虎丘,袍笏端正亲自入坛致祭,所在成会,俗称山塘看会。各乡土谷神这一天都要到坛督祭,咸执手版,谒城隍神,虎丘土地王珣为地主,为尽地主之谊,袍笏降价迎接。舆车仪仗,炫耀如云,士女舟车,填骈道路。

据《礼记·郊特性》“天子大蜡八”。郑注：所祭有八神也。水庸七。水庸，沟也。古代城市多有护城沟渠，所以它就成了城市保护神。但正式称城隍神，则始见于《北齐书》，将城隍神立祠祭祀，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唐以后各郡府州县均立祠奉祀城隍，祈保地方平安。到了明代，城隍崇拜之风达到极致。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诏封天下城隍，并规定城隍庙殿的高广铺设均参照阳间四级官衙设置，明清两代官员上任，头一件事便是拜祭当地城隍。苏州景德路上的城隍庙便是在明代建造的，作为地方保护神，城隍一般都是生前有功于民的人，死后加封的，苏州的城隍，前为春申君黄歇，以后有汤斌、陈宏谋、吴坛继、陈鹤等。凡城隍出会苏州各庙趁机敛收费用，凡境内居民，每户献纳一副、十副不等，即交制钱若干，称解天饷。苏州城内城隍庙俗称“大庙”，庙会演剧，香火特盛。山塘河中画舫云集，买卖赶超，所在成市，“冶游士女宫巷出，出塘寒食看迎神”。可见其场面热闹。如今金秋十月虎丘庙会以全国各地民间技艺、地方戏曲、民间小吃为主，成为了虎丘金秋旅游的一大品牌亮点。简而言之，虎丘庙会对旧传统的传承和变异既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审美特色和地方文化特色，又反映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以及人们多元的文化需求和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关注。

## （二）苏州地区庙会文化空间人文性、地方性的文化特征

从古到今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苏州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从隋唐开科取士以后，苏州人攻习之风更盛，人才辈涌，名家辈出，特别是明清这段时期，苏州人更是人才荟萃之地，他们各领风骚，构成了苏州星光灿烂的人才群体，他们的喜好崇尚、生活雅事常成为市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又是古代社会文化的集中载体，一般都有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生活上的种种情趣和喜好，对社会风尚具有重要的倡导作用，一般民众往往趋之若鹜，竞相模仿，进而也逐渐对苏州民俗、民风产生影响。苏州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使得源远流长的吴文化在“江南偏安”的历史造就

中得以较多保存,逐渐形成“尚文好学”之风,形成了多文化世家、多藏书典籍、多人文景观的人文环境,隋唐以来苏州知识阶层著书立说、吟诗作词、丹青描绘使苏州的文化积累代代因袭,绵延不绝,表现为苏州民俗文化色彩较高的特色,苏州民风重节好游成风,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引领下形成了发达的旅游文化,苏州在唐宋以后人才辈出,是我国人才荟萃为天下最盛地区,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或游学交友来到苏州,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赋诗撰文极力赞美和夸饰吴地的农产品和山水人物风俗之美,使吴地民间的寻常物产和乡土人情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情韵,唐朝苏州当过刺史的就有一位大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在苏州主政期间为民谋利,救灾济贫,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他们的诗文开了一代文风,言行和崇尚,更带动和推动了吴人刻意追求精美,崇文好学、重节好游之风,苏州古代就有相当发达的旅游文化,苏州好游之风,顺应天时地利、天人合一的生活观念由来已久。吴王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夫差继位,更是“日与西施为嬉,夏则避暑消夏湾,秋则登高吴山”。唐白居易为解苏州城百姓跋涉之苦,亦为游虎丘方便,开塘修堤,成就了繁华的七里山塘,他自己曾颇为自豪地赋诗到:“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唐宋以来文人雅客多聚苏州,游历山水,吟诗作画,苏州地方的庙宇道观也是文人喜欢游历的地方,引领着民间的文化习俗向人文化方向发展,由此文人雅客的推波助澜,明清时期游历之风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据清褚人获《坚瓠集一首集》:“苏人好游,袁中郎宏道诗云: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苏州人重节好游,还表现在文人的游赏与四时八节的民俗活动密切结合,形成了苏州庙会文化空间不仅具有人文性的特征,而且更具有了兼容性、地方性的特征。清徐珂也在他的《清稗类抄·风俗类》说苏州城中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苏州民间信仰中最庞杂的五通神的信仰,历代都有苏州地方官的禁止和毁庙行动。但总是死灰复燃。笔者从88年开始曾多年跟踪调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香火更盛,其

影响遍及苏南、浙江、安徽等地。在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善男信女从苏州城乡、上海、无锡、常熟,乃至浙江嘉兴、湖州等地赶到苏州石湖上方山五通神庙烧香祈神,所谓“借阴债”是上方山最著名的民间信仰活动。旧时,每到此日,由巫婆男觐装神弄鬼,愚弄百姓。每年此时月上时分,一名巫婆由两人扶持着疾奔到香火最旺处,突然翻眼颠蹶称五通老爷上身,口中念念有词。这时,借债人上香烛钱粮,叩头祈祷。巫觐随即开出借贷条件,借债人答应后,就在神案上取四个纸制小元宝,带回家放在祠堂内。几天后再看,如元宝未走样,则说明已借到阴债,神会暗中助你发财。否则说明未借到,明年再来重借。所谓借到了阴债,并非真从五通神庙中借到了钱,而是指神会在暗中相助,使你日后财运亨通,发家致富。借了阴债之后,如果真发了迹,每逢朔望都要在家烧香拜神,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还须到上方山去烧香“解钱粮”,向神偿本付息。如果本人死了,子孙仍需继续“清偿”。所以,苏州又有一句歇后语,叫“上方山的阴债——还不清”。此后,借阴债不只限于农历八月十八夜,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这种活动。此时山下石湖一带成了盛大的庙会。买香烛、蜡扦、金元宝、小吃、民间小工艺制品等。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是典型的宗教型庙会。<sup>4</sup>

苏州吴江震泽镇双杨庙会,是个跨省、跨县市的水上盛会,它的地方性特征非常明显。始于清朝中叶,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采访过当地的耆老,据他们介绍。双杨是吴江重要的蚕丝产地,产出的蚕丝为湖丝中的上品,颇受江浙丝业的推崇,成为江浙经加工发展地,所以双杨庙会是以蚕丝行业为依托的民间活动。1924年大约是最后一次举办,农历三月,先有各圩会船66条,每条都铺上木板成为水上舞台,表演戏文、杂耍,沿途不断有个庙会船加入,在梅堰停留两天,在盛泽逗留七天庙会进入高潮,河中桅杆林立,歌舞不断。最后各圩的船散去。剩下的船队再至震泽镇慈云寺前再演三天的谢戏。双杨庙会的特色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且都是水上活动,遍及沪宁、沪杭线城

4 详见2009年中国民俗学会南昌学术年会,拙作《苏州上方山五通神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乡。直接受益的是蚕丝交易量上升,各种服务生意顿增加。临河居民居民也搭台卖坐。有谚语说:“坐要坐钱,立要立钿。”在吴江盛泽镇,到了小满,新丝上市,生丝交易开始,有先蚕祠祭蚕神的民俗活动,由盛泽镇丝业公所出资延请戏班演戏三天,俗称小满戏。《盛泽竹枝词》有生动的描述:“先蚕祠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新斗状。”<sup>5</sup>

### (三) 苏州的庙会文化空间的群众性、实用性文化特征

苏州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还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兼容性与实用性等文化特征,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有闲钱阶层的文化,它是世俗的,货真价实的,平易近人的。比如农历四月十四民间传说是吕仙诞日,是苏州民众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苏州有轧神仙之俗,神仙庙即福济观,原在阊门下塘,相传八仙之一吕洞宾此日化为乞丐,混迹观中救度众生,城乡民众聚集观中以祈遇仙救度,称轧神仙。有病之人皆到观中“天医院”求神方治病,米粉五色糕名神仙糕,帽铺制垂须钹帽,名神仙帽,虎丘花农担卖花草,名神仙花,还有神仙茶、神仙龟、神仙衣等,所卖之物皆以神名,市民此日剪万年青,苏州人称千年盖叶弃掷大门口,任人踩踏,祝曰:“恶运去,好运来。”再到庙会上买新叶植之,谓之交好运。是日,城中妓院妓女皆至神仙庙烧香祈福,因苏州妓院以吕洞宾为其行业神,故此日必至庙烧香。清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生日庆纯阳。玉洞神仙天上度,青楼脂粉庙中香。花市绕回廊。”关于“轧”字,顾禄在他的《清嘉录》中是这样解释的:“轧,吴人谓人众不得出力附之曰轧。”吴语一个“轧”字生动地描绘出人山人海和神仙同轧同乐的盛大的庙会场面。

苏州吴江的黎里镇是个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小镇。从八月初一到八月十六,几乎天天都有“出会”。初一初二的东岳会;初五初六的刘王会;七月初八的毛家池刘王会;十四十五的小天会,十六的夫人会。民国十年(1921)

5 参见《江苏历史文化名镇——震泽》,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新编《盛泽镇志》,第429—432页

以后增加了初三初四的朱天会,以及十三日的施相公会。初一到十三是“小会”,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大会,组织者大体上市分工,经费轮流摊派,“小会”由当地渔民操办。“大会”由镇上商界举行,商界实力雄厚,因此出会的队伍装扮整齐,整容庞大。由此黎里镇出现了从事印刷神佛纸马的行当。嘉庆《黎里志·风俗》记载:“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彩。”由此可知在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市场交易频繁,生活比较富裕之后,民众祈望风调雨顺,生活美好,因而酬神日勤,对神灵的崇拜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合二为一,所以迎神赛会又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同时使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带上了市井的色彩、商业的色彩。也反映了苏州庙会文化空间群众性、实用性文化特征。所以有学者说:“许多江南庙会就是圣神与凡俗的混合体”。<sup>6</sup>

结语:庙会起源于古代的宗庙祭祀,人们聚集在一起膜拜、进贡、歌舞享神,慢慢形成了一定的仪式,进而成为后来庙会的雏形,道教、佛教在民间的生存竞争也有意无意推动了庙会的进一步发展,名目多样的宗教活动为了吸引信众,扩大自己的影响,许多民间的娱乐业逐渐增加进来,所以庙会发展到后来成为了群众聚会,也成为了各地饮食、民间技艺、民间曲艺、歌舞交流展示的平台,也促进了当地商品贸易的繁荣和发展,各类小商小贩也在庙会上设摊设点,形成了周期性的集市,如苏州玄妙观,大量市民即使不拜神,也会常常去庙会逛逛。观前街就是在玄妙观前形成了著名的商业街市。“庙会这种依附于特定场所和宗教活动而发展起来的集宗教祭祀、娱乐游艺和商贸交易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已经定型,并广布全国城乡各地,渗透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sup>7</sup>

(沈建东:苏州博物馆研究员)

6 曹荣、华智亚:《民间庙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0页。

7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